

# 讲述故宫文物南迁故事

□ 王诗霖

1933年,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掠,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一万多箱故宫文物南迁,时延十数年,地逾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艰辛。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九十周年,九十年前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中。”身为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的作家祝勇怀着这样肃穆的心情,写下长篇纪实文学《故宫文物南迁》,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从《故宫的古物之美》专注于器物文明到《故宫六百年》的全面抒写,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的另辟蹊径到《故宫艺术史》的宏大架构,祝勇用长达几百万字的主题书写构建起了

一座“纸上的故宫”,试图以当代视角完成一个文化学者对古老文明的独特解码与重述。

这一次,祝勇的故宫书写,进入到一个深水区: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抗战时期发生的国宝南迁。

作家以丰赡的细节还原历史原貌,以翔实的考证重现南迁历程。在写作进行的两年中,除了在故宫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章,祝勇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随同故宫博物院专家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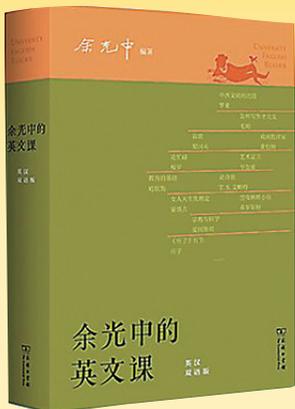


《故宫文物南迁》

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 《余光中的英文课(英汉双语版)》 博雅教育的优秀读本

□ 张鹏禹



《余光中的英文课本》

余光中一首小诗《乡愁》,令无数华夏儿女为之感动。现代著名诗人的身份外,余光中在散文、评论、翻译等方面也有精深造诣。他曾长期任教于大学外文系,多年讲授英美文学,以英诗与翻译两课最为人称道。上世纪70年代,为提升学生的英文能力和文学欣赏水平,余光中主持编纂了一部《大学英语读本》,遍搜中外名家名作,辅以简介注释,以期学生获得更好的博雅通识教育。时隔半个世纪,该书以《余光中的英文课》为名,由商务印书馆以英汉双语形式重新出版。

《余光中的英文课》最大特色是内容全面、选文精到;编选得法,自成一体。该书收录的33篇选文,来自32位作者。全书以本涅特的《经典何以经典》领衔,作者认为一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文字造诣高超是基本条件。其后两篇,毛姆在《怎样写作才完美》中拈出清晰、简洁、悦耳三要诀;萧伯纳的《戏剧评论家》力主剧评家须独立不群,具备“追求完美艺术的激情”。

剧评后的两篇选文扩展到电影与绘画。希区柯克以《新铸的语言》形容自己从事的艺术,现身说法,示范如何运用电影语言。毕加索的《艺术宣言》主张绘画是为了“发现”,其本质是“或多或少令人信服的谎言”。第六篇是艾略特的诗论,其《论诗歌》把诗歌的鉴赏分为三阶段,由初期选佳劣劣的享受,到加入知性的组织与鉴赏,再到遇见当代新诗作参酌经验加以重新组织。艾略特的诗歌和评论影响深远,这篇选文不仅供读者管窥艾略特的风格与论点,还可作为阅读诗歌的参考。

该书随后选录的6首英美诗歌,依序从16世纪的莎士比亚,到20世纪的弗罗斯特,分别是莎翁的《乡村之歌》、济慈的十四行诗《久困在都市的人》、惠特曼的《我歌唱自己》和《一堂天文课》、狄金森的《蛇》、弗罗斯特的《雪夜林畔小驻》。余光中使出英诗教授看家本领,对入选诗作用心批注,解说形式与内容、意象与意义、表面与象征、观察与想象、文体发展及文学史上的意义,强调朗读欣赏诗歌的音韵之美。这些都来自他多年读诗、译诗、教诗的心得,阅读的过程有如跟着诗人上了一堂英诗课。

第十三篇是全书唯一的短篇小说,契诃夫的《哀歌》。随后4篇中,《琐事》为典型小品文,字字珠玑,平凡中见妙趣;马克·吐温的《回忆母亲》透一透则小故事,生动呈现19世纪美国女性的真诚、坦率、幽默、悲悯与勇气,令读者如见其人;梭罗以特立独行、离群索居闻名,他的《论忙碌》提醒世人检视人生;霍弗在《人、游戏和创造力》中指出游戏与艺术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性,呼吁以游于艺的心态面对人生。

第十八到第二十一篇的4位作者,时代、背景与身份各异,主题却都涉及大学生、阅读、教育、知识与学习,洞见频出。第二十二篇是林青的《葛底斯堡演说》,作为全书最短的著名散文,仅260字,是书中极少保留的先前读本常选的文章。此后几篇选文涉及科技与科普,比如爱因斯坦的《宗教与科学》、克拉克的《我们永远无法征服太空》、斯柯尼科夫的《技术与世界政局》等。

余光中一向关注中西文学、思想与文化,授课时常引入中西比较的观点。读本最后五篇选文中,前3篇《〈论语〉五十节》《〈庄子〉五节》《史记·李将军列传》介绍中国儒家、道家与史家的代表文本,续以罗素与汤因比的两篇思辨文章。罗素的《中西文明的比较》以跨文化的视野,对比中西文明,说明各自特色与优劣。汤因比写《我为什么不喜欢西方文明》时已75岁,是其研究世界各大文明多年后的反思。余光中特别提到,压卷五篇选文的取材和编排,“我自命是‘革命性的’,不免有点沾沾自喜”。

学者单德兴认为:《余光中的英文课》始于经典的定义与功能,接着重视文字与修辞的作用,经由广泛的艺术引入诗论,继而赏析英美诗作与短篇小说,再进入面貌繁复、具有文学性与启发性的散文,衔之以英文重新阅读中华文学与文化经典,总结于中西文明的比较与批判。细读各篇固然开卷有益,总体观之更见其结构有机,井然有序,前后呼应,“体现出余光中如何透过语文学学习达到博雅教育的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余光中的英文课》为英汉双语,邀请清华、北大、人大、北外、上外等校英语名师和顶尖学者联袂翻译,读者可以同时领略到两种语言的无穷魅力。

本版稿件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 用双脚丈量 大地的辽阔

□ 董世捷

作家阿来曾说,行走与写作是他的宿命,于是有了这部行走笔记《西高地行记》。作为阿来的最新散文集,该书收录作家2011年后创作的9篇长散文,包括《故乡春天记》《嘉绒记》《贡嘎山记》等,留下作者行走四川、西藏、云南、贵州、甘肃等地途中,对自然的观察和对历史、文化以及人生的思考。

《西高地行记》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立体的,这种立体不仅体现在阿来的笔力之厚重,更体现在其内容之多维。阅读《西高地行记》里的一字一句,仿佛跟随阿来走进藏地。他写大地、星光、山口,写银环蛇、野人、鱼、马,也写群山和各种各样的自然之声,在无形之中增添了读者在地质学、生物学、植物学等方面的知识储备。阿来说:“我们在大地上行走,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文化史,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才能书写这片大地。”《西高地行记》堪称作家献给藏地、献给自然的崇高礼赞。

在行走中,阿来不仅看见了天地的

广阔与雄伟,也在自然的一草一木一枯荣中生发出对万事万物的思考,捡拾起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遗留至今的诗意与沧桑。《山南记》一篇中,阿来“在这山上看见那么多正在开放的花朵,以此看到了生态脆弱的高山草甸还生机勃勃”,由此“想起人类文明的消长与命运”,想起美国人利奥波德所说的“像山一样思

考”。在《武威记》一篇中,阿来行走在河西走廊,时常想起《凉州乐歌》《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等古诗,过去与现实仿佛借由这些咏叹之声得以连通。阿来称自己为“自然之子”,凭借常年行走于自然的经历,他的笔端流淌出别具一格的文学世界以及文学之外更加辽阔的旷野高山。

作家卢一萍读过此书后感叹:“我认为《西高地行记》有一种在温暖、悲悯之上的神圣感。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山南市、武威市、丽江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绵阳市平武县以及嘉绒藏区,构成了一个个文学高地。”他认为,《西高地行记》是阿来“像山一样思考”的结晶。

“阿来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有力拓宽了文学表达的疆域,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文学建立起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让文学脱离了世俗的庸常和浅薄,真正地立了起来。”评论家谢有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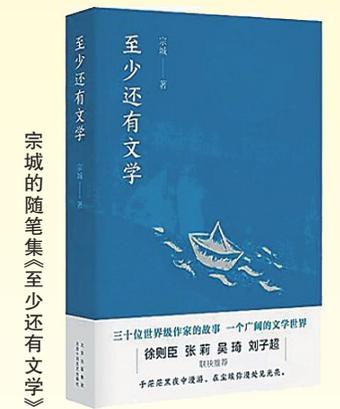


《西高地行记》

## 文学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读宗城《至少还有文学》

□ 袁恒雷



宗城的随笔集《至少还有文学》

青年作家宗城的随笔集《至少还有文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以客观的笔调、细腻的情感,对30余位中外作家进行评传式解读,运用横纵对比的写法让一众困惑读者的疑问迎刃而解。通读全书会发现,文学和生活紧密相连,它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本书解读的诸位作家无一不是个性独具又垂垂文学史的名家。按说他们多拥有不止一本传记,想要写出新意难度很大。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采用的是评传手法,而不是写这些作家从出生到死亡的完整一生。作者提炼出作家生活与创作的连接点,深入作家心灵,寻找作

品的诞生与作家命运的关联。书中对菲茨杰拉德的书写令人印象深刻。宗城以“1907到1919”“1920到1929”“1930到1940”三个时间段来刻画人物。这种划分,不仅暗合美国社会发展,更是菲茨杰拉德创作与生活的三个重要阶段。此外,作者牢牢抓住生活与文学的紧密联系,对深刻影响菲茨杰拉德的女性进行了精彩讲述。菲茨杰拉德的初恋女友姑内瓦出身豪门,与平民菲茨杰拉德门不当户不对。遭到女友父亲坚决反对后,二人最终分手。关注到菲茨杰拉德这一深刻的心灵体验,作者解读说:“菲茨杰拉德始终铭记那个夏天,他在往后的小说里,在黛西、格洛丽亚、琼斯、罗斯玛丽这些女人身上,一次次重复姑内瓦给予他的欢乐和感伤,尽管他对此长期否认。”

宗城的书写采取平视视角,他绝不一味唱赞歌,而是在客观讲述作家人生高光时刻的同时,也直陈他们或众所皆知或鲜为人知的不足。比如作者认为,太宰治对太田静子的抄袭主

要有两处,一是“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一名句,二是“在新小说一筹莫展,又被太田静子的日记深深吸引后,在威逼利诱下,他公然把她的日记作为《斜阳》的底本,稍作修改后拿来发表”。即便这种类似剽窃的行为得到了后者允许,但宗城依然认为,不能忽视原作者被遮蔽的光辉。他的批评是客观节制的:“今人礼赞太宰治的才华,也应正视那些才华背后的真正贡献者,至少,出版社所能做的,是在《斜阳》的书封上,不只署上太宰治的名字,也让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太田静子,回到她理应站的位置。”

通过这种平视书写,我们对这些名家名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而宗城的书写也如他自己所说,“没有采用教条的学院分析式话语,而是试图在‘学理性’和‘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把作家们的作品和故事更生动地展现出来。”得益于宗城扎实的案头工作、深入肌理的阅读以及横纵对比的灵活写法,一众作品的精髓在书中被娓娓道来。